

·东瀛遗珍·

《延历僧录》中的唐人传记 ——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辑佚

王 勇

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,佛教方面的事迹自不待言,涉及建筑、美术、工艺、书法、医学等领域,甚至连传播豆腐、香木、砂糖、纳豆、茶道、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簿上。

虽然后世的传闻不可全盘视作信史,但从一个侧面佐证鉴真在日本影响的广泛和持久。著名的鉴真研究权威安藤更生博士说过:“日本人直到今天,依然在很多方面沐浴着鉴真和上的恩惠。”^①

鉴真之所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,其事迹在中日两国长久传颂,除了鉴真本身具有伟人特有的才学和品格,与他的几位同样出色的弟子密不可分。尤其是自始至终跟随鉴真抵达日本的唐僧思托,撰写了两部经典性著作,即《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和《延历僧录》。

《延历僧录》成书于788年,被誉为“日本僧史之滥觞”,实应归为佚存东瀛的唐人著述。尤其是鉴真、思托、道璇、仁干等赴日唐人的传记,可补唐代僧传之阙。遗憾的是,该书完本散失已久,目前收集到的遗文仅为原书的约四分之一^②,且未经标点、校注,学者叹为缺憾。

本文从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、《东大寺要录》、《扶桑略记》中辑录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的相关遗文,进行基础性校勘和考

释,希冀为鉴真研究提供一些新资料。

一、《延历僧录》

鉴真于753年携徒24人抵达日本,763年在奈良唐招提寺圆寂。思托在鉴真生前即开始为师树碑立传,鉴真示寂不久撰成《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3卷。思托在日本生活20余年后,于延历年间(782-805)又完成《延历僧录》,共为142人立传,人物涉及帝王、皇后、官吏、僧侣、居士等,堪称奈良时代文化人士的传记总集。

关于《延历僧录》的成书年代,《招提寺千岁传记》(明律篇·思托传)云:“延历七年撰述《延历僧录》一卷。”能满院义澄所撰《招提寺千岁传记》3卷,成书于元禄十四年(1701),由于年代太过晚近,又未明示具体依据,日本学者对“延历七年(788)”说颇存疑义,饭田瑞穗、藏中进、中井真孝等做出过种种推测,把时间框定在延历四年(785)至延历十三年(794)之间。然而,大阪府长野市古刹金刚寺藏《龙论抄》所引《延历僧录》,云“延历七年^鑑二月乙卯朔三日壬午”,此书抄于正和四年(1315),虽然干支有些问题^③,但与《招提寺千岁记》相印证,而且有月日的记载,可信度是比较高的。

前引《招提寺千岁传记》说《延历僧录》为“一卷”,显然是不确切的,因为目前我们收集到的遗文中,发现有“《延历僧录》第二”乃至“第五”等文字,说明卷数不止1卷。江户时代的《本朝台祖撰述密部书目》标明为“十卷”,小野玄妙的《佛书解说大辞典》、权威的《国书总目录》、近出的《国史大辞典》等,均据此定为“十卷”。然而,成书于延长三年(925)的《山王院藏书目录》、成书于天福元年(1233)的《弥勒如来感应指示抄》、前述金刚寺本《龙论抄》均作“五卷”,目前大多数学者也据此定为“五卷”。笔者注意到《山王院藏书目录》、金刚寺本《龙论抄》还提到“《延

历僧录》目录一卷”,该书入传142人,原来有个详细的目录,所以确切地说《延历僧录》应为6卷。

《延历僧录》的作者为思托,当无疑问。《山王院藏书目录》记载:“《延历僧录》五卷,《延历僧录》目录一卷,唐沙门思托。”金刚寺本《龙论抄》列出更有价值的资料,其文如下:

《延历僧录》五卷天台沙门释思托撰

第一卷始自鉴真高僧合七人传灯大阶弥述藏

第二卷始自上宫太子王帝并十人

第三卷始自仁干合二十三人智光光仁等石口中高僧

第四卷沙门五十八人贤璟平备半行行表等也

第五卷僧十四人居士三十人

《延历僧录》目录一卷

天台沙门尺思托撰

延历七年_{岁次}二月乙卯朔三日壬午撰

唐天台宗僧也付鉴真和尚渡倭州

《延历僧录》的遗文散见下列各书: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、《东大寺要录》、《东大寺杂录》、《扶桑略记》、《太子传古今目录抄》、《圣德太子平氏传杂勘文》、《上宫太子拾遗记》、《龙论抄》、《弥勒如来感应指示抄》、《太子传玉林抄》等。综合各书的遗文,入传人数总共142人,其中以下32人的传记有逸文可考^④:

第一卷:鉴真、道璇、思托、荣睿、普照、隆尊(共7人,今存6人);

第二卷:圣德太子、天智天皇、圣武天皇、光明皇后、桓武天皇、乙牟漏皇后、文屋净三(共10人,今存7人);

第三卷:(共23人,包括仁干、智光、光仁等,传记无存);

第四卷:(共58人,包括贤璟、平备、行表等,传记无存);

第五卷:(沙门)庆俊、戒明、明一、神睿、慈训、弘耀、惠忠;
(居士)藤原良继(感神功臣大夫居士)、藤原不比等(政事居

士)、藤原继绳(东大寺长官居士)、藤原鱼名(守真居士)、藤原种继(真木尾居士)、石上宅嗣(芸亭居士)、佐伯今毛人(东大居士)、石川恒守(泷渊居士)、淡海三船(淡海居士)、中臣镰子(崇真居士)、大中臣诸鱼(班爵居士)、穗积加古(加古居士)(共沙门14人、居士30人,今存沙门7人、居士12人)。

《延历僧录》虽名“僧传”,其实立传不限于僧侣,可以看作是一部奈良时代文化人士的传记总集,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此书还因为保留许多中日交往的珍贵史料,包括渡日唐人(鉴真、道璇、思托、仁干)的传记,可补中日史书之不给。

二、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辑佚

日本建长元年(1249),奈良东大寺尊胜院主宗性,广泛搜罗历代僧传加以抄录,3年而成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3卷,卷三抄录的《延历僧录》的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,兹录如次(俗字、古字尽量照录)^⑤:

高僧沙门释鉴真传

《延历僧录》第一云:释鉴真者,广陵龙兴寺僧也。俗姓淳于氏,齐大夫淳于髡之后。行李参玄^[1],二十一具戒。精勤律藏,五载穷微。学海翰林,词渊^[2]义府。施^[3]戒为功,讲律为务。

○于开元年中,有崇福寺主僧明演^[4]来白云:“今崇福寺破落,请大和上降临于彼,讲律授^[5]戒,修营功德。”依请赴彼,讲大律等。修造大殿,殿梁柱大,四尺五寸径头,河深岸陡^[6]难上。金刚^[7]变为牛,引木尽上,寺竟,其牛即死。大工匠夜梦见金刚,语云:“我相助造殿,上木已毕。”僧乃知牛是金刚作耳。

又欲构塔,其江都县令陈明府^[8]向洲^[9]衙,马上忽见塔上雾气结成九层。语典言:“其塔本有七级,如今九层。”细看^[10]乃是彩云二重,结于塔上。在后造塔三层^[11]积上,级九八角,

高五十七丈,下三重基,基开四门八面。乃今罗睺法师^[12],检校造塔亦毕,叹无舍利。时有梵僧,将舍利五千粒来,乃尽从请得,二千粒于塔上供养,便放光明。余三千粒随身供养。海若^[13]大风时,即见神人于塔边立,身等于塔。

又寺东院造文殊院,堂中弥勒左右铸铁文殊、普贤,堂画^[14]万菩萨。其匠人安文殊师子,太近于后,一夜,师子自跪向前三人。

又受城中东南奉法寺请,讲律受^[15]戒,铸像造殿门宇等事。先令惠融^[16]禅师取殿木,其殿簷被江水下,急漂落朱山^[17]下,去泊簷筏也处二十里。融禅师发愿造金铜观音像,船夫力乏^[18]尽卧,忽起乃云:“有二十僧,水中牵簷。”睡觉,只见簷逆水流行,直至杨子^[19]东河上木处。

○和上弟子亦感祥瑞,天垂甘露,地漾星珠。即江洲^[20]庐山东寺^[21]僧志恩,以唐天宝九载春三月,于寺晋远^[22]法师甘露坛上为僧尼受^[23]戒,天降甘露。初但密云,露点衣粘手。其江洲^[24]大守尝之,味甘逾蜜。以匙稇^[25]树叶上,得一,外色紫黝^[26]。如是经二十日,日日天降。于是道俗共相欢咏:“唐恩瑞同晋远。”四方公子各振金声,于时缘事不暇度本。

○我生将尽,一期命尽,卷舒出没,古今同然。爰于宝字七年岁次癸卯五月六日,隐几^[27]端坐,阖^[28]焉而化。容彩俨然犹生,情灵归乎迁寂。春秋七十有七。今编上高僧传,录以呈万代矣。

注

[1]行李参玄:“李”通“理”,《别雅》:“行李,行理也。”犹言钻研佛学奥义。

[2]渊:底本作“浏”,乃“渊”俗字。

[3]施: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本录作“辨”,于义不通。“施戒”即“授戒”,与后句“讲律”呼应。

[4]明演：唐开元间扬州崇福寺的寺主，除《延历僧录》外尚不见其他文献记载。

[5][15][23]受：此处当作“授”。《延历僧录》中“授”、“受”多混用。

[6]𡵓：《玉篇》：“𡵓，峻也。”同“陡”。藏中しのぶ录作“险”，误也。

[7]刚：底本作“𠂔”，系“刚”俗字，下同。

[8]陈明府：唐开元间江都县令，“明府”是对地方官的尊称，非其名讳。

[9][20][24]洲：当作“州”。《延历僧录》中“州”、“洲”多混用。

[10]看：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》本录作“者”，于义不通。

[11]三层：从前后文判断，当作“二层”，恐宗性抄录有误。

[12]罗睺法师：“罗睺”非姓名，系罗睺罗之略。《大日经疏》曰：“罗睺是交会蚀神。”传为佛之嫡子，在胎六年，生于成道之夜，在十大弟子中为密行第一。故疑“罗睺法师”指梵僧。

[13]海若：海神。《六家诗名物疏》云：“裨海外复有大瀛海环之，海神曰海若。”

[14]画：底本似“尽”，二字繁体形近，从文义判断当作“画”。

[15]箨：《尔雅翼》：“箨，音脾，大桴。”木制者称“箨”，竹制者称“筏”。

[16]惠融：慧沼（650-714）弟子，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大历六年（771）条云“会是岁嵩山大比丘释惠融至自广陵”，《惠运律师书目录》所载《维摩经记》的作者“江宁牛头山惠融”，《东域传灯目录》所载《华严经私记》的作者“牛头融”，疑为同一人。

[17]朱山：“朱”，诸本录作“几”。

[18]乏：诸本录作“之”，恐误。

[19]杨子：“杨”当作“扬”，此指长江。

[21]东寺：“东林寺”之略。

[22]晋远：东晋时的高僧慧远（334-416）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：“至庐山东林寺，是晋代慧远法师之所居也。远法师于是立坛授戒，天降甘露，因号‘甘露坛’，今尚存焉。近天宝九载，有志恩律师，于此坛上与授戒，又感天雨甘露。道俗见闻，叹同晋远。”

[25]稊：《玉篇》：“缘也。又束得也。”此字漫漶，诸本录作“稊”，《大日

本佛教全书》本疑为“撩”。

[26]黠:字见《四声篇海·里部》。《中华字海》认为是“黠”的讹字。《四声篇海》释“黠”为“美发”、“黑色”。此字藏中しのふ误录为“黠”。

[27]几:底本作“凡”,意改。

[28]闾:此字漫漶,有待后考。

上述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引载的鉴真传记,恐怕不会是全文(有“○”标记的段落当有节略),内容主要叙述鉴真在唐时的事迹,最后一段谈到示寂的情况,没有涉及6次渡海的艰辛过程及赴日后的传教活动。所幸的是,《东大寺要录》^⑥引录的《延历僧录》遗文,涉及到鉴真赴日后的活动。此书始成于嘉承元年(1106),长承三年(1134)以后屡次增补,内容非常丰富,史料价值也高。全书共10卷,卷第四《诸院章第四附神社·戒坛院》载:

《僧录》云:胜宝六年四月初,于卢舍那殿前立戒坛。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,次皇后、太子亦登坛受戒。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。胜宝七年,卢舍那佛前受^[1]戒。胜宝八年四月,于卢舍那殿前,天皇十八种物令唐僧作羯摩。京城诸寺僧集,和上曰:“今天皇羯摩十八种物,并唐僧进毕。”近参坐末,唐僧进受^[2]戒,少远坐举众不伏。人人面作色之中,有兴福寺僧法寂,起立大叫,出粗言。忽倒地^[3]殒。悉皆息心安隐作羯摩。从此已后,一切所作,无诸笏难。已上。

注

[1][2]受:此处当作“授”。

[3]面:“而”的形讹。

除此之外,平安末期的《扶桑略记》(抄二)^⑦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(754)正月丙寅条,也有一条《延历僧录》遗文:“鉴真和尚持戒弟子五人将来,传弘戒律。^呈”

三、鉴真传记的史料价值

在中日关系史上树立光辉典范的鉴真和尚,其事迹因真人元开撰写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而流芳百世。此外,宋代的《宋高僧传》、元代的《佛祖历代通载》、明代的《神僧传》中也有相关资料,国内出版的鉴真传记书籍,大多依据上述文献史料,而唐代鉴真弟子思托撰写的《延历僧录》,却不见有人完整利用。其实,《延历僧录》中的这篇鉴真传,包含不少新资料。

首先,开元年间鉴真应崇福寺主僧明演之请,到崇福寺讲律修殿事,颇多细节,如运送殿梁柱之艰辛等,均为其他书籍所不载。

其次,在江都县构建9层佛塔,梵僧施舍利5000粒,也是一条重要史料。其中2000粒供养佛塔,3000粒由鉴真带到日本,现在还供奉在唐招提寺,每年举行“舍利会”。这里出现的江都县令陈明府及检校造塔的罗睺法师,笔者寡闻,不见于其他文献。

再则,“寺东院造文殊院”,推测指扬州开元寺(鉴真本寺)的文殊院,有关文殊、普贤的铁像的记载,可为唐代扬州寺院增添逸闻。

最后,应扬州奉法寺请,“讲律授戒,铸像造殿”,以及关于惠融禅师的记载,为我们了解唐代扬州建造佛殿、佛像时材料来源、运输手段等提供珍贵的信息。

还需值得一提的是,《东大寺要录》中讲到天平胜宝八年(756)鉴真为天皇十八种物作羯摩时,日本僧众俱感不服,一方面佐证天皇对鉴真一行的倚重和信任,另一方面也说明鉴真赴日传播戒律,开始阶段曾遭到不少阻力。

笔者推测,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应当包括鉴真6次渡海过程的描述,虽然现在收集到的佚文中未见相关内容,但《延历僧录》的《思托传》中的相关记载,可稍稍弥补这一缺憾:

将舍利三千粒请本国供养,海中被龙夺,船破,八十余人

各自救身。思托没命取得舍利，并救得真和上。

又于一时船飘落大阳，有四金鱼龙，绕船欲夺舍利。三日行蛇龙海，船看欲没，众尽念佛四天王。夜，水手来告：“有四神人，身被金甲。”众闻心安。神人现后，船出水高常五尺。明有四白鱼，引船前行。三日飞鱼海，五日飞鸟海，二日无物，都得十四日，上岸求^[1]淡水，过小岗，见一池有清冷好^[2]。汲水上船。明更取水，但见陆地，知是化出池耳。

又于一时船至阿儿奈波岛，岛有石窟。唐僧义静入中安禅，遭魑魅失心。思托因采槟榔，见救得义静上船。其日船发。

胜宝六年岁次甲午二月四日，至圣朝。敕令于东大寺行坛法，此乃传戒圆。

注

[1]求：底本作“水”，今意改。

[2]清冷好：“清”底本作“情”，今意改；“好”后疑脱“水”或“泉”字。

这段文章主要讲渡海过程中思托舍命保护“舍利三千粒”，内容上与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中的“时有梵僧，将舍利五千粒来，乃尽从请，得二千粒于塔上供养，便放光明。余三千粒随身供养。海若大风时，即见神人于塔边立，身等于塔”相衔接，故推测《高僧沙门释鉴真传》散佚的部分，内容大致与其相近。

注：

①安藤更生：《鑑真》，[日]吉川弘文馆，1967年。

②和田英松编撰的《国书逸文》（1940年），已经注意到《延历僧录》佚文的收集，该书从《东大寺要录》、《扶桑略记》两书中辑录《延历僧录》12人传记佚文，遗憾的是未把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纳入辑佚范围。1992年藏中しのぶ发表《〈延历僧录〉校释（一）影印校本篇》（《大东文化大学纪要》第30期），最大限度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辑佚人数达到32人。藏中しのぶ做了一个很好的《延历僧录》校本，可惜没有把录文进行标点断句，对抄本的字词辨识偶有失误。

（下转第158页）

⑪《道藏》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7册，第228-306页。

⑫同④，第592页。

⑬同④，第450-453页。

⑭孙诒让曰：“疑亦传写移易，非其旧也。”（同④，第506页）

⑮同④，第596页。

⑯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30页。

⑰同⑯，第19页。

⑱同⑯，第43页。

⑲魏徵：《群书治要》，影印宫内厅书陵部藏镰仓写本，汲古书院，1989年，第五卷，第256-281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

（上接第127页）

③二月朔当为“己卯”而非“卯”，“乙”、“己”恐为鱼鲁之误；三日应为“辛巳”而非“壬午”，两者相差一天。

④详见后藤昭雄：《平安朝汉文文献之研究》，[日]吉川弘文馆，1993年。

⑤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录文，以东大寺图书馆藏宗性手稿本为底本，参考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》本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本。下同。

⑥《东大寺要录》据筒井英俊校录本，[日]全国书房，1944年。

⑦《扶桑略记》据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》本，[日]吉川弘文馆，1965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
東大寺要錄

一二三七

《东大寺要录》

(京都大学图书馆)

延曆僧錄卷之三 鑑真和尚傳
 下段之復亦奉衣云二十一具戒精勤律藏五戒窮微學海精林
 詞同教府之戒焉四講律焉勢。於開元年中有慈福寺主僧
 明俊來白云今慈福寺破落請大和上降臨於彼講律受戒胎管
 功德依請赴彼講大律寺修造大殿、梁柱大四尺五寸徑額河
 序序門難上全歸愛焉手引奉書上寺竟其寺亦元大工匠匠步
 見全對語云我相助造殿上本已早信乃知半是全對作年又欲
 修塔具江都縣令陳明府內洲衙馬上忽見塔上雲氣浩渺九層
 語曲言其塔本有七級如今九層細看乃是教雲二重法於塔上
 在復造塔三層上級九八兩高五十七丈下三重基、開四門
 八面乃今灌順法師檢校造塔之畢教雲舍利時有梵僧持金觀

《延历僧录》

鑑真傳